

孩子的价值及对孩子数量、 素质和性别的选择

王俊祥

一 引言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人口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方法探究和分析生育率的经济决定因素,提出了“生育率经济学”或“生育率经济理论”。最早运用这种研究方法的是列宾斯坦。50年代,他借助纯理论的简单模型第一次阐明决定生育率水平或降低生育率的机制。他认为,夫妇之所以决心生育孩子,只是由于孩子的边际效用大于边际负效用。得自孩子的效用有三种:一是直接得自孩子本身的效用,视孩子为广义的消费财货;二是从孩子的收入或劳动中间接取得的效用,视孩子为生产财货;三是作为潜在的保障来源的效用,如期待孩子提供晚年的生活保障。另一方面,增加孩子的负效用,来自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直接费用是养育费和教育费,间接费用是随机费用,即孩子不工作而去上学因而失掉的收入,以及母亲为分娩和抚养孩子而放弃的收入。此外他还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增添孩子的效用和负效用,还要受到收入以外因素的影响,其主要是死亡率的下降和职业分布的变化。进入60年代,贝克尔则把消费者选择的理论运用到生育率分析上,视孩子为耐用消费品,借助孩子的数量和素质之间进行选择模型,阐述了决定生育率的机制。他认为,当孩子是直接的效用来源时,对生育率水平的决定可以借助在孩子和其它消费财货之间进行选择。他认为,增加对孩子的支出会提高孩子的素质,而素质的提高又会增大孩子的预期收益和服务。所以,家庭收入水平提高后,为孩子所增加的支出大部分将用于提高孩子的素质。即便对孩子数量的需求有可能增长,也是有限的。这样会促使生育率下降和生育孩子数量的减少。

上述理论有其合理的内涵。它比较科学地阐明了孩子对父母或家庭的价值,揭示了制约生育率变化的经济性因素,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这些理论也有某些欠科学之处:把孩子作为“商品”,引进

价格因素,并且仅从家庭或父母的内部条件考虑,而未从社会方面分析影响生育率的决定因素,因而在许多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面前深感困扰。

从我国的人口增长情况看,近几年出生率和增长率有较大幅度的回升,人口形势严峻。毫无疑问,人口的增长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制约,但人口增长较快直接与人们的生育观和生育行为有关。分析人们的生育观以及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各种因素,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人口增长较快的直接原因,并寻求解决人口问题的对策。本文以孩子的价值及对孩子数量、素质和性别的选择为题作一初步分析。

二 孩子的价值及其内容

孩子的价值,是指孩子需求主体与孩子客体之间的效用关系。没有这种效用关系,就谈不上孩子的价值。从孩子对需求主体的效用看,一方面表现为家庭效用,即孩子对父母的效用,它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另一方面表现为社会效用,即孩子对社会的效用,它决定社会对人们生育行为的态度。因此,孩子的价值分为家庭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方面。

首先从家庭价值来看,夫妇既是孩子的需求者,同时又是孩子的供给者。夫妇是否生育孩子,生育多少孩子,则是以孩子的家庭价值极大化为基准。一般来说,孩子的家庭价值分为正价值和负价值。所谓正价值,就是孩子为家庭或父母带来的预期积极效用。负价值则是孩子给家庭或父母带来的消极效用,或者说是家庭或父母为生育孩子所付出的代价。家庭正价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价值,即孩子成为经济活动人口后为家庭带来的经济收益。二是非经济价值。它主要包括:(1)精神效用,即能满足家庭和父母的某种精神需要,增加家庭欢乐氛围,乐享天伦;(2)赡养效用,即能解除父母老弱病残时的后顾之忧,颐养天年;(3)继承效用,即由孩子继承家业,“传宗接代”。孩子的家庭负价值是由孩子本身带来的,它主要包括:(1)

孕晚期间的时间和食品消耗；(2)养育孩子的生活费用支出；(3)孩子受教育时的智力投资和相关费用支出；(4)孩子生病所支付的医疗费用；(5)为孩子结婚所支出的费用等。孩子的家庭正价值和负价值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并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如果正价值大于负价值，夫妇生育孩子的意愿就强烈；如果正价值小于负价值，则夫妇便可作出不生育或少生育的选择。总之，家庭价值是决定夫妇生育动机和生育行为的直接诱导原因。

其次，从孩子的社会价值看，孩子不是家庭和父母的私有财产，而是全社会的财富，因此，孩子同样具有社会价值。孩子的社会价值也有正价值和负价值之分。正价值包括：(1)维持人类社会的世代更替、延续和发展；(2)孩子成长为劳动力后，作为经济活动人口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推动社会再生产发展；(3)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看，孩子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未来与希望，是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负价值主要是指国家培养孩子所提供的生活资料，所花费的教育费用等。为了社会经济和民族的延续发展，保持一定的生育率是必要的，社会支付一定的孩子培养费用也是必需的。但是，生育孩子过多，就会远远超过由正价值决定的社会对孩子需要的满足程度，负价值也因生育孩子过多而增大，并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在生产力水平和国民收入一定的条件下，用于孩子消费的部分过多，会造成人均收入下降，影响前期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若维持现有全部人口生活水平不变，就得减少积累，那样又将影响扩大再生产；并且还会造成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就业困难、生态环境失调等社会经济问题。

家庭价值与社会价值是孩子价值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的联系是，家庭价值是社会价值的基础，社会价值是扩大形态的家庭价值。二者的区别除了内容不同以外，还表现为不同的利益关系及其矛盾。家庭价值体现的是个别家庭利益，社会价值体现的是整体社会利益。家庭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矛盾反映了人类生育问题上的家庭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

三 对孩子的数量需求及其选择

无论是对于家庭，还是对于社会，都需要生育一定数量的孩子，这是由孩子的价值决定的。但是，由于孩子的家庭价值和社会价值不同，对孩子

的数量需求也是不同的。因此，在孩子数量选择上也有差别。首先，从家庭或父母来看，对孩子的数量需求是由孩子的家庭价值决定的，并且是在家庭正价值和负价值的比较中进行选择的。孩子在家庭中的正价值和负价值是同时存在的(除非不生育)，任何家庭或父母都不可能只取得正价值，而不取得负价值。一般说来，只有当孩子的家庭正价值大于负价值时，父母才愿意生育子女。非经济价值是父母生育孩子的目的和动机之一。因为它满足了父母精神、赡养和继承等方面的需要，尽管不同人有不同的需求内容和层次。但满足这一需要，并不一定要生育较多的孩子，因为生育孩子过多同时会给父母带来的负价值增大。促使父母多生育孩子的原因主要是基于孩子经济价值的考虑。孩子成长为劳动力后能为父母带来家庭利益，生育一个孩子能增加一份收益，生育两个则能多增加一份收益，以此类推，孩子越多，给家庭带来的收益越多。尽管孩子的家庭负价值随孩子增多而增加，但实际用于孩子的各种费用不一定呈倍数关系，甚至还有下降的可能。这种状况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较为普遍。如我国的广大农村，主要以人手劳动为主，多生育一个孩子意味将来多增加一个劳动力，家庭收益增加，家庭正价值上升；与此同时，负价值又因养育孩子的生活、教育等费用减少而下降，这就导致孩子的家庭正价值大大高于负价值。因此，农村父母对孩子数量需求过多。相反，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由于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以及劳动力就业的竞争，用于孩子的各种费用不断增加，负价值上升，并且孩子作为劳动力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收益有下降趋势，从而使正价值下降。这样，父母不愿生育较多的孩子，这是导致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下降的直接原因。

社会对孩子的数量需求是由孩子的社会价值决定的，也是在社会正价值与负价值的比较中进行数量选择的，并以此为据制定人口发展目标。社会是由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构成，社会发展需要人口的不断延续，因此，社会正价值决定了社会需要生育一定数量的孩子。生育孩子的数量既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生育孩子过少，长期低于更替水平，将会导致社会或民族的衰亡；生育孩子过多，就会使“两种生产”比例失调。用于孩子的各种消费支出增加，社会负价值上升，从而会影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影响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一个国

家不管采取什么样的生育政策，都与孩子的社会正价值和负价值有关。如果社会正价值高于负价值，国家往往采取鼓励生育子女的政策措施；如果社会负价值高于或大大高于社会正价值，国家则要采取控制生育的政策措施。我国对孩子的数量选择的基本原则是控制数量、提高素质，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这个政策就是从我国人口过多、增长过快、社会负价值增高这一实际状况出发而制定的。

在家庭或父母对孩子的数量选择与社会对孩子的数量选择之间存在着一定矛盾。有时从社会正价值考虑，要求父母多生育孩子，而父母则从家庭负价值考虑，不愿生育或多生育孩子；有时从社会负价值考虑，要求控制生育，但父母从家庭正价值考虑，则愿意多生育孩子。为了把人口生产纳入整个社会有计划发展的轨道，克服人类生育上的无政府状态，除加强宣传教育外，还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使父母对孩子的数量选择服从于社会对孩子的数量选择，不能因家庭利益而损害国家整体利益。

四 对孩子素质的选择及其原因

在现代社会，无论家庭还是社会，都十分重视孩子的素质，希望孩子个个健壮，并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如果说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医疗技术等落后条件下，人们比较重视对孩子数量进行选择的话，那么，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已由对孩子的数量选择转移到对孩子素质的选择上，即在保持一定数量孩子的前提下，把提高孩子素质摆到了重要位置。从根本上说，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科学技术进步的表现。但是，由于孩子的家庭价值和社会价值不同，因而在对孩子素质选择上也有各自的原因和特点。

家庭或父母之所以重视孩子的素质，主要是基于孩子家庭价值特别是正价值的考虑。尽管提高孩子素质要增加孩子生活和智力费用的支出，有可能使负价值上升，但负价值也会因孩子素质提高而下降，相抵之后正价值仍增值。首先，提高孩子身体素质是实现家庭正价值的前提。只有生育体力、智力健全的孩子，才能给父母带来精神寄托和尽照顾与赡养义务。如果生育的孩子身体素质差，或是畸形儿，或患有严重疾病，或中途夭亡，会给父母带来生活负担和精神痛苦，甚至赡养父母、继承家业也将成为泡影。其次，提高孩子的科学文化素质可以使家庭正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上升。因为，孩子经过教育掌握了较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就容易找

到理想的就业岗位，并能从事较复杂的工作，这样就能为家庭或父母带来较多的经济收益。当然，受经济、教育等条件的制约，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家庭对孩子素质的选择也有不同特点。如城市家庭对孩子素质的选择不仅要身体素质好，更要科学文化素质高；而农村家庭比较注重孩子身体素质，轻视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社会重视孩子的素质的选择是因为提高孩子的素质能提高社会正价值，降低社会负价值，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孩子身体素质的高低关系到未来劳动力质量的高低，从而直接影响物质资料生产质量的好坏。孩子身体素质好，可为国家的经济繁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优越的人力资源。孩子科学文化素质高，可不断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力高速发展。没有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就没有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发展，也就不会有现代科学技术，从而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生产力。此外，孩子的思想道德素质对社会经济发展也有重大的反作用。由此可见，提高孩子素质是提高孩子社会正价值的重要途径。同时，提高孩子素质还可抑制孩子数量，减少社会为劣质孩子所支付的各种费用，从而降低社会负价值。因此，社会从各方面为提高孩子素质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这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促进社会进步的重大抉择。当然，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发展水平不同，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孩子素质提高的程度还存在一定的差别。

五 对孩子性别的选择

社会对生男生女的态度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一般没有性别选择偏向，生男生女都一样，并希望男女比例保持基本平衡，以利于人类社会的协调和稳定发展。

但是，家庭对孩子性别的选择却存有极强的偏向度。不同国家和不同家庭或父母对孩子性别选择具有不同的特点。欧洲各国和美国，夫妇普遍希望有1~2个孩子，对孩子的性别没有强烈的倾向。一般在生第一个孩子时，对性别的选择不明显，而在生第二个孩子时，希望两个孩子是一男一女者占绝对多数，希望连生两个男孩又明显地比希望生两个女孩的更为普遍。我国在实行计划生育以前，也具有上述国家的特征，对孩子性别选择倾向并不十分突出。但是，实行计划生育以后，特别是提倡一对

(下转第25页)

目前每月40元的实际值,在2050年达到目前每月60元的实际值,是完全可能的。

(四)在集体给予务农老人与非务农老人养老金的标准上继续保留适当差别,以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再逐步缩小

上海市农村地区在原有的养老制度下,乡镇企事业单位退休的农村老人领取的退休金明显地高于务农老人领取的养老补贴。我们认为这种差别,主要是由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及价格体系不合理造成的,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除,因此新体制在集体给予务农老人与非务农老人的养老金标准上,仍保留适当差别,使乡镇企事业单位退休的农村老人领取的养老金比务农老人要高些。比如,南翔镇在原有的养老制度下,务农老人大多数每月领取11元养老补贴,而乡办和镇办企业的退休老人平均每月要领取50元退休金,村办企业的退休老人平均每月要领取30~40元退休金。这次实行的新体制则暂定务农老人每月领取养老金“基数”为15元或17元,村办、队办企业退休老人每月领取养老金“基数”为22元或25元,另加工龄补贴(1年工龄0.50元);乡办、镇办企业退休老人每月领取养老金“基数”(上接第62页)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以来,希望生育男孩的倾向明显增强,特别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农村更为强烈。由此产生严重的超生现象。

为什么家庭或父母如此偏爱男孩呢?这主要与男孩价值与女孩价值的差异有关。实际上,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对于家庭或父母来说都能满足家庭或父母的精神需要,能履行对父母的赡养义务等,因而都具有家庭价值。家庭或父母之所以偏爱男孩,是因为男孩的价值大于女孩的价值。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1)男孩在体力上优于女孩,是强劳动力,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收益大于女孩;(2)男孩成婚后,多一个劳动力,增加家庭收入;而女孩成婚后,离开家庭,少一个劳动力,减少家庭收入;(3)男孩是父母进入老年时的经济支柱,使老年生活有保障,免除后顾之忧;而女孩一般不能完全独立担负这一责任和义务;(4)男孩是家庭和家族利益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而独生女则意味着原家庭和家族的衰亡;(5)由于男女生理上的差别和存在对女性的歧视,在社会招工、入学等方面男性优于女性。

从以上可以看出,家庭或父母对男孩的偏爱,不仅仅是感情问题,除了受传统观念,如多子多福、

为30元,另加工龄补贴(1年工龄0.50元)。对于担任过镇或乡管企业副厂长(包括同级干部)及以上的退休人员,每月加发干龄补贴(1年干龄0.80元);担任过村管干部的退休人员每月加发干龄补贴(1年干龄0.70元)。凡给予干龄补贴的退休人员,就不能领取相应年份的工龄补贴。

我们感到在农村养老保险新体制中,尽管对上述的具体支付标准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和完善,但在现阶段保留这种差别,是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在试点过程中也受到广大务农老人和非务农老人的拥护。这种差别只能在今后几十年中,随着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采取低标准向高标准靠拢的办法,使务农老人与非务农老人领取养老金标准的差距在共同增长的过程中逐步缩小。

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我们只是进行了初步探索。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农村的情况千差万别,我们所作的一些探索,只是希望能对今后上海郊县乃至中国其它类似的农村地区进行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有所启示。

(本文责任编辑:朱犁)

(作者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

传宗接代等影响外,还有许多实际问题。

六 研究孩子价值的意义

孩子的价值问题是人口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是人口理论研究领域的拓宽和发展。这一理论是从家庭和社会两个方面来研究人们的生育行为,解答人们为什么生育、生育多少等古老而又现实的问题,以丰富人口学理论宝库。同时,通过对孩子价值的研究,可以揭开许多疑惑不解的谜团。例如,从理论上讲,经济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应当使生育率趋于上升,为什么实际上却导致了低生育率?通常认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会下降,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说“穷人生孩,富人生财”?还有西方国家即使采取鼓励生育政策,人口增长仍很缓慢,而我国采取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人口增长速度仍然较快,这又是为什么?这些问题如用孩子价值理论解释,就比较容易理解。再有,通过研究孩子价值理论,可以找出人口增长过快或人口增长过慢的家庭和社会原因,从而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对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行调节,以保证人口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总之,研究孩子的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责任编辑:孙淑清)(作者工作单位:河北大学人口研究所)